

# 文物的“复活”,传统的“新生”

## ——《国家宝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研究

董甜甜 凌继尧\*

**[摘要]**《国家宝藏》作为一档原创的电视节目,以文物为载体,运用极致的电视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进行了恰当的现代语态表达,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不仅反映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更说明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更需要在创新的外在形式下,传播民族精神的内核。论文分别从仪式与趣味结合下的严肃而活泼的艺术形式塑造、人物与文物在前世今生中的跨时空叙事表达,以及国家和个人在传统和历史关照下的民族文化建构三方面来论述《国家宝藏》如何运用创新的方式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播,以期对未来传统文化的“新生”,并树立真正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宝藏》;文物;传统文化;传播;创新

《国家宝藏》是中央电视台继《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优秀文化综合类电视节目之后的又一力作。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国家宝藏》总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定义其是“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戏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sup>①</sup>。该节目整合全国九家国家级博物馆的优秀文物资源,推出27件文物供选择,在每家选送的三件镇馆之宝中由观众选中一件参加故宫博物院的大型特展。这是一场“国家宝藏”的“选秀”,是在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让观众学会欣赏文物的同时愿意走进博物馆,这更是对中华精神和文化的内核延续,是一场真正的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之旅。节目开播即获得热烈的追捧,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3分,并被朋友圈和各大媒体圈持续刷屏。显然,被以年轻人为主导的互联网自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充分显示《国家宝藏》的成功。以极致的电视化语言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让文物“活”起来,这种“记录式综艺语态”<sup>②</sup>的大力创新是节目成功的关键要素。而快节奏生活压力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对文化渴求的情感补偿

\*董甜甜,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凌继尧,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1189。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C15AZD035)阶段性成果。

①于晓:《国家级综艺新旗舰诞生 央视〈国家宝藏〉首播爆火》,中国新闻网,2017年12月4日, <https://www.chinanews.com/yl/2017/12-04/8391981.shtml>

②《〈国家宝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电视台的扛鼎之作》,央视网,2012年11月27日, <http://tv.cctv.com/2017/11/27/ARTIFIQqWX2n5alsdlThJB3R171127.shtml>

需要,“泛娱乐化”时代下的各类缺乏文化内涵的真人秀等节目的泛滥和同质化带来的视觉上审美疲劳,以及经济腾飞的文化“空心化”呼唤传统文化和文化美育的回归,这些都为《国家宝藏》这样的传统文化节目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到“七一讲话”中将“文化自信”提升到战略高度,再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可以看到弘扬传统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在国家层面重中之重。《国家宝藏》正是在此背景下央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所履行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的诚意之作。这种以艺术形式创新为外在,以传统文化精髓为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当代传承的作品,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学习。

## 一、仪式与趣味——严肃而活泼的艺术形式再塑造

对“娱乐至上”和感官刺激的不懈追求,以嬉笑怒骂、热闹喧嚣的呈现方式成为大多数综艺节目的常用手段。这样的形式虽轻松有趣,但大部分节目缺乏文化的深度,观众只是在被动的娱乐氛围中陷入表层、瞬时、无序的刺激中,理性思维和主动思考的能力被大大削弱,文化教育功能更无从谈起。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使受众在娱乐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精神、信仰和灵魂。娱乐节目如一味追求娱乐性,忽视节目文化品位及审美价值,受众在感官体验之后易出现精神虚无感。”<sup>①</sup>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家宝藏》即通过运用充分的仪式感,以较为严肃的艺术形式完成传统文化传播的这一核心功能。为避免过多的仪式感造成曲高和寡的局面,《国家宝藏》则以多种创新的形式在仪式感和趣味性中找到了良好的平衡点,塑造了既严肃而不失活泼的艺术形式。

仪式源于远古的先民们通过一种集体的舞蹈、庆祝、典礼等活动,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和群体认同。“仪式通常被视作一种标准化的、表演性的、象征性的,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一种沟通和维持群体活动的途径。”<sup>②</sup>正如约翰·费斯克认为仪式就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sup>③</sup>。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则认为“在仪式观视角下,传播被认定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受众被传播内容所营造的共同的身份聚合在一起,产生强烈的认同感”<sup>④</sup>。《国家宝藏》正是这样,汇聚九大博物馆镇馆之宝,由馆长坐镇点评,并以讲述文物背后故事等艺术形式构建传播场域,以文物作为载体传播传统文化,引起观众的文化共鸣和民族骄傲。这种“宣称具有历史意义的、宣扬和解的、颂扬进取精神的以及以崇敬的态度制作、播出的电影电视节目”<sup>⑤</sup>即为媒介事件。因而,《国家宝藏》作为媒介事件,其本身就是一场传播传统文化的仪式。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还认为,“人类是符号动物,个人和社会的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符号活动这个中心而开展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在进行符号互动。”<sup>⑥</sup>在节目的呈现中,“印信”作为一个醒目的符号贯穿节目的始终。根据符号互动的能指和所指理论来看,印信符号的能指是信用和承诺。而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守护和文脉的传承则是意指。从节目的开始,守护者在博物馆寻宝结束后,手持印信说出,“我是×××,我是×××的守护人……”,到镜头切入演播厅,守护者再次手持印信,放入仪式台,再到文物的故事介绍完后,守护者们共同被颁发印信,并持印信在庄严的宣

① [美]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② 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③ [美]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④ [美]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⑤ [美]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⑥ 刘建明、徐开彬:《“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誓中结束这一过程。“印信”作为承诺和守护的象征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环节,既强化了浓浓仪式感,营造了庄重严肃的氛围,更让守护者和观众在神圣的仪式下接受文化的教育和传承理念。此外,在舞台上,守护者简洁的正装服饰,在前世故事演绎之前,用演讲的方式对其守护的文物进行简要的介绍,从服饰和语言上将观众拉入仪式中,且在最后的宣誓中把这种神圣感带向高潮。这种循序渐进的仪式感营造,潜移默化的电视语言表达,在瞬间唤起了所有人内心深处对中华文明的骄傲和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更唤起了守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脉的历史使命感。同时,馆长们圆桌会议式的点评,更是增加了整个文化传播仪式化中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易被人们接受和信任。最后,节目的灯光设计,尤其是光束的聚合再散开的效果及音效的配合,无疑更加强化了仪式感的氛围。整个过程连贯自然,把人们从庸碌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并以符号、语言、视觉等方式完成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的传播,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一般印象中,传统的文化类节目重说教而轻娱乐,缺乏一定的趣味性,跟文物相关的节目更是如此,如之前的《寻宝》《国宝档案》等节目也仍然以专家评判和专业解说为主要形式,不免会有些吸引力不足,也常常出现叫好不叫座的局面。梁启超说:“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sup>①</sup>他把趣味视作人活动的不懈动力,是人类创造力的支撑。由此可见,创新不足而缺乏趣味性的节目是很难吸引人的。《国家宝藏》充满创意的趣味性则是节目的一大亮点。首先体现在选择在年轻人群体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甚至具有强大粉丝效应的明星人物。积极向上、热爱演艺事业、充满正能量是他们的标签。从当红少年易烊千玺到对收藏情有独钟的“和珅”王刚等,这些对观众来说熟悉并喜爱的公众人物加入,以及与主持人风趣幽默的互动,无疑都使节目增添了更多轻松和亲切的元素,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其次,节目开场以真人秀的形式,为明星守护者安排寻宝任务,为文物的引出设下悬念,形式新颖而有趣。加上不同明星守护者的个人风格不同,在博物馆寻找守护其国宝的过程中也别有一番趣味,如在第一期王凯寻找“瓷母”时愉悦地戏称名字的“霸气”,见到真正的“瓷母”(又名“各种釉彩大瓶”)时,再一次被霸气的名号和不拘一格的审美风格所折服。那种表情让所有的观者感同身受又深领其意,自然会心一笑。他幽默年轻化的演绎方式显然易被年轻人读懂。再次,节目巧妙地设置“前世今生”的这种穿越古今的方式来讲述文物的故事,并以戏剧小剧场的方式演绎,这种创新有趣的视觉化处理方式也更适应当下图像时代人们的心理诉求。节目不仅在前世故事本身选择上注重故事的历史性和趣味性,在其故事内容和小剧场的演绎方式则更加“接地气”。最被网络热议的莫过于王凯演绎的乾隆造“各种釉彩大瓶”时被吐槽的审美,尤其在梦中被其偶像黄公望和王羲之,及父亲雍正的反对和质疑,更被网友戏称是360度3D式旋转“diss”(网络语:鄙视)。而选择这样的前世故事,一是乾隆的审美是网友们讨论过的热点话题,直面的演绎和这种敢于“自黑”的精神更易赢得年轻人的好感。二是以欲扬先抑的手法,不仅展现文物的制作故事,更为乾隆的良苦用心正名。因此,在其最后表达“大国盛世,就应海纳百川!”的大国情怀之时,观众网友的感动和自豪的情绪被瞬间激发,这源于技艺精湛的工匠精神,更源于胸怀宽广的大国风范。最后是大气华美的舞台视觉设计,既充满古典韵味,又极具现代感,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视觉设计融合了纱盒投影视觉呈现、透视冰屏柱视觉呈现、透视冰屏柱台型变幻、巨型环幕视觉呈现四大特点于一体。”<sup>②</sup>巨型的沙盒立方体在文物介绍环节,利用投影模式再现了文物的影像全貌,弥补了观众无法看到真实文物的缺憾。而采用的9根高达6米的透明冰柱屏幕结合长43米、高7米的巨型LED环屏主屏幕,不仅营造了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多维立体的舞台空间,更

①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②《揭秘〈国家宝藏〉舞台灯光设计》,搜狐网,2017年12月7日,[http://www.sohu.com/a/209019443\\_283238](http://www.sohu.com/a/209019443_283238)



通过冰屏柱前后、上下的位次调整,以及在主屏幕显示的为每个文物设计的独一无二的背景,巧妙完成了节目中场景更替和环节场景环境的构建,不仅完美呈现出话剧舞台的质感,更让人仿佛亲临博物馆,整体效果精美绝伦、逼真自然而又充满趣味。此外,节目多样化的环节设置,使其有趣而不乏味。主持人张国立的个人定位和主持风格成熟稳重而又幽默风趣,与《国家宝藏》的节目风格十分契合,也使其成为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一座重要桥梁。

文化类节目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接地气”,但同时保留应有的严肃性,在既轻松又庄重的氛围中实现其文化功能。显然,《国家宝藏》做了一个最佳示范。如总导演和制片于蕾所坚信的,“博物馆和国宝一点都不沉闷,只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去讲述它们。”<sup>①</sup>以仪式表达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和骄傲,以趣味完成其现代的转化和接受,这也许就是《国家宝藏》展现的最佳角度。

## 二、文物与人物——前世和今生的跨时空叙事表达

如果说以趣味性和仪式感打造的节目形式只是从外在吸引观者的话,那“在视听时代,文化信息符号在大规模向视听化、体验化转化和汇聚”<sup>②</sup>的背景下,《国家宝藏》则以前世今生的视听化叙事结构,用故事和戏剧串联起“文物”与“人物”的历史时空和文化情感的联结,从内在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所说的电视叙事强调的是电视故事化的讲述方式。”<sup>③</sup>即如清华大学尹鸿教授所说的,《国家宝藏》以“文物讲述故事,故事浸透文物,明星与戏剧形态结合,实现了文化类节目从抽象感受到具象表达的转化,国宝为载体,回望历史,诠释文化,可以说是真正中国式的节目创新”<sup>④</sup>。以下从两方面阐述文物与人物在前世今生的跨时空叙事表达。

一方面,以明星、素人和专家的互文解读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节目前世今生的叙事架构从三个层面,层层深入,挖掘文物真正的故事和内涵。第一个层面是明星守护者在前世小剧场里,以戏剧化的表现演绎“国宝”产生的背景和与之相关的故事。不仅有李晨扮演的宋徽宗作为伯乐,发现王希孟这位少年天才,成就了《千里江山图卷》的旷世奇作;更有刘涛版本的“妇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战神,“妇好鸮尊”便是对这位优秀女性的最高褒扬等等。文物背后的故事在结合历史史实和一定的艺术创造之后,在戏剧化和视觉化形态的精彩演绎中,展现着勃勃的生命力。它让文物不再是一个躺在博物馆里无生命的器物,而是可以勾起观者对文化和历史的情感连接。如果说第一层的明星演绎是历史的追溯,那么第二个层面邀请普通素人对文物的讲述,则是离我们最近的现代传承。这些人有的是科学研究者,努力用现代科技挖掘文物隐藏的基因密码;有的是普通的博物馆志愿者,以对文物的热爱,为游客们讲述关于它的前世今生等等。其中在《千里江山图卷》的今生故事中,对此画研究了四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冯海涛老师,用原作创作的方式和颜料,耗时两个月复制了《千里江山图卷》的十分之一,让观众了解到此画卷要历经五个图层等这样十分繁杂的创作过程。而提供颜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的传承人仇庆年,则演示了矿物颜料制作的基础过程,通过手工捣碎矿石后筛出粉,加水搅拌160小时,到最后分4层漂洗得到颜料可以看出颜料得来不易。而这些矿物颜料的珍贵程度有的超过宝石和名贵药材,都让观众在新奇中增长了知识。不论是冯海涛老师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复制,还是仇庆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坚持和努力,都让我们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感动于他们对中国

①吴亚雄、蒋波:《这出“宝藏的诞生”凭什么这么高分》,人民网,2017年12月8日, <http://ent.people.com.cn/n1/2017/1208/c1012-29694185.html>

②庞井君:《传统广播影视转型的理论透视和战略选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戴本祠:《论综艺节目的叙事建构》,《当代电视》2016年第2期。

④于晓:《国家级综艺新旗舰诞生 央视〈国家宝藏〉首播爆火》,中国新闻网,2017年12月4日, <https://www.chinanews.com/yl/2017/12-04/8391981.shtml>

传统文化浓浓的爱。最后的层面是馆长们对文物前世今生的学术点评。他们从史实的角度分析文物的历史背景,并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角度阐述其重大社会意义。如果说在前世的小剧场故事里的寓教于“乐”还不够权威严谨的话,那么馆长们的话则是专业的再次修正。

另一方面,在人物与文物的内涵融合中体现情感的温度。在前世今生的文物主体叙事中,不管是对明星守护者还是普通素人守护者的人物选择上,始终都在坚持挖掘他们与文物的内涵融合,从物理联结自然过渡到心理联结,在共同的对文物的守护信念下引起情感的共鸣。这一方面体现在明星守护者的自身气质与文物气质上的一致性。年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的不同让每一个明星守护者与众不同,而守护与之匹配的文物,则更像是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如王凯自身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演员,率真活泼而不乏稳重的性格,显得年轻而自信,这不仅与其扮演的乾隆角色匹配,更与相对年轻、“颜值”华美、彰显大国自信的“各种釉彩大瓶”的气质相互呼应。而梁家辉守护的先秦时期的石鼓,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石刻,经历几千年的风霜之后,其古朴的造型、斑驳的文字像一个经历岁月打磨后的长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兴衰和文明发展,传承着中华的文脉。年届六旬的梁家辉先生在经历岁月的洗礼中所展现出的从容淡定,对祖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守护石鼓和中华文脉笃定的信念,都让石鼓和梁家辉之间在穿越历史的光隧中找到了某种气质上的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明星守护者在前世小剧场故事中,对文物的理解和角色人物的二次演绎,更是在情感上达到了人物与文物的内涵融合。如第二期节目中,段奕宏守护的“越王勾践剑”中,他扮演的正是“越王勾践剑”这把剑的真身,其在深刻领会越王勾践剑的历史背景基础上,以自己的理解在不断的旁白演绎中将越王勾践的隐忍、不屈、无奈以及对国家复兴的强大信念,以“物”的身份饱含深情地演绎出来,让原本一件冰冷的“器物”像是活出了灵魂,让人动容和感动。正是这样精彩完美的二次演绎,才让演员和文物之间进行了一场灵魂的交汇、情感的共融。最后一方面,人物与文物的内涵融合还体现在普通素人对文物的理解和坚定守护上。发现妇好墓并挖掘出“妇好鸮尊”的郑振香女士,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考古学家,正是她的坚持才让沉睡三千年的殷商大墓重见天日,她本人的敢想敢做、为考古事业奋斗一生的人生品格正是与“妇好”这位巾帼英雄有着共通之处,更是对妇好精神的充分发扬。“曾侯乙编钟”的守护者谭军和他的学生们,以他们高超的音乐素养,为编钟这一古老乐器焕发充满生机的生命力作着不懈的努力。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都足以看出他们在自己的平凡的工作中不断深化对文物精神的理解,并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与文物的内涵上融合,也正是如此,才让他们更坚定了守护的信念。

叙事作为常用的修辞手段“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sup>①</sup>。文物背后的故事不仅让文物“活”起来,缩短了其与观者的距离,更是心灵上的共通和融合。《国家宝藏》正是运用这种巧妙的叙事表达,在讲述文物从前世到今生的跨时空的故事中,让观众在紧密相连的文脉传承中沉醉其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震撼,更在守护者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守护的感召中唤起自己对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样的教育和叙事方式才是真正的润物细无声。

### 三、国家和个人——传统和历史关照下的民族文化建构

《国家宝藏》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仪式和趣味性结合的艺术形式、前世今生的叙事表达,更在于其对当下中国社会脉搏的准确把握,回应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普遍感到的认同焦虑和文化饥渴,在传统和历史的关照中进行民族文化的建构。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情感、理智等方面关于历史、现实、家庭、

<sup>①</sup>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社会等所获得的适切感和归属感”<sup>①</sup>。英国学者霍尔认为认同问题“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sup>②</sup>。本质上,认同是一种文化建构行为。《国家宝藏》即是在当前经济腾飞的前提下,民众对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高涨的情况下,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建构。这也是在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中展现国家和个人的情感融合,是在穿越千年的时空交汇中,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国家宝藏》对民族文化的建构,体现在历史文脉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关照当下。这里的关照当下是指对现代社会的折射和启发。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传承在当下的关照。尤其是在前世今生的讲述中,守护者们对守护国家文物的信念感让更多人从个人角度开始重新审视对国家历史、古老文明的态度。例如第二期王刚在博物馆中见到“曾侯乙编钟”时震惊骄傲,并恭恭敬敬深鞠一躬。而在允许破例近距离欣赏编钟时,他难掩兴奋,并小心翼翼甚至是战战兢兢,脚步轻柔,细看时手捂口鼻,深怕呼吸的气流会对文物造成侵蚀。这样的敬重和谨慎,让每个人感受到他对“曾侯乙编钟”的情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王刚作为一名公众人物,这样的个人行为显然会对观者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使观众在感动之余,更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骄傲,在民族自信意识的觉醒中达到强烈的情感共振和文化认同。而从普通人的讲述中,让人们了解到他们用实际行动和执着的信念在我们身边不曾在意的小事中履行着守护的誓言。也许,真正的守护其实就是从这一刻起,从我做起。同时,通过《国家宝藏》这样的电视节目,引导观众走进博物馆也是传统文化传承在当下关照的重要体现。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桥梁,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然而浮躁的社会氛围很难让人们静下心来认真欣赏每一件文物,同时陈旧呆板的文物展示方式也很难让人们提起兴致。如何让文物不在博物馆中沉睡,并在大众文化的生活中醒来,也是《国家宝藏》致力于解决现状。《国家宝藏》在与国家级博物馆的优势资源合作中,将博物馆的国宝推向聚光灯下、推向舞台,以创新的电视语言让观众看到国宝们与众不同的魅力,展现属于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而对当下关照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个人生活和人生的关照启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期撒贝宁对“云梦竹简”的守护。这些竹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规模秦代竹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这些竹简在前世的小剧场故事中,展现了一名作为普通基层公务员“喜”对其工作的勤勉和热爱,对法律的严谨和尊崇。而且这些“云梦竹简”还是“喜”的重要陪葬品,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珍视,这不仅是清廉,更是对法律本职工作的真正痴爱。也正因此,才为后世留下了这样珍贵的法律史料。在“云梦竹简”今生故事的主角们,是一个个普通的基层民警——现代的“喜”。他们年轻有朝气、热爱法律、热爱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为“依法治国”奉献着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作为最普通的工作者,却在用他们的体验告诉我们,对工作充满热爱,用最大的热忱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就是民族复兴路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在历史的关照下体会家国情怀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则是《国家宝藏》节目民族文件建构的另一重要方面,也是最终目的。如果说上述对现实关切是侧重个人的,那么这则是从个人上升到国家的情感,因而家国情怀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现实关切和个人情感的升华,也是《国家宝藏》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的终极目标。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第一期节目中,由梁家辉在对国宝的守护中引出的故宫守护人梁家五代人与石鼓不可分割的故事。在日军侵华的战乱之际,为免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被洗劫和流失,梁家人开始承担文物南迁中的石鼓守护的使命,第一代守护人梁廷炜辗转全国16年护送石鼓抵达南京,抗战结束后,他的儿子再次将石鼓完好地送回故宫。而第五代守护人梁金生老先生如今

<sup>①</sup>王岩:《个体生命的文字承载 尘封历史的声音复活——〈朗读者〉与〈见字如面〉的比较分析》,《中国电视》2017年第8期。

<sup>②</sup>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继续守护着石鼓和其他的故宫文物。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36年,在最近的七年,他清点出总数186万余件的故宫文物。七年间只做这一件事,也许枯燥无趣,但在梁老先生看来则是饱含情感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前辈们的信念和心血。梁老先生一家五代对石鼓的守护,正是把家与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甚至老先生的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由石鼓迁移的地址来起的。这看似只是一家人职责的守护,但却是由内而外的对民族和国家的满腔热血和深深的自豪。而梁老本人在博物馆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并乐在其中,做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工作。这正是梁老先生对优秀家风的传承,更是对中华文脉、民族精神的发扬,还是个人情感到国家情怀的递进和升华的显著体现。《国家宝藏》也正是这样,从守护文物的人和他们的与文物的故事,到传承千年文脉的民族大义,对个人情感和国家情怀的挖掘层层递进、丝丝入扣,使观众的情绪被慢慢调动起来,真挚的情感让他们感觉自己与国宝、与国家命运一脉相连,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sup>①</sup>2016年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更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2017年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sup>②</sup>因而,以创新的艺术形式把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恰当表达,努力传播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这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部署,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根本。《国家宝藏》力求通过多样化的电视语言让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物“活起来”,通过具有艺术观赏性的设计来为观众展出“国宝”,并对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进行深入而充满新意的解读。让观众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也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正如央视综艺频道节目部主任吕逸涛所说:“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基因,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文化,热爱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文化,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sup>③</sup>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根本的标志。《国家宝藏》以文物为载体弘扬传统文化,在文物的历史和现代的背后故事中唤起个人和国家的情感升华。

#### 四、结语

经济的腾飞带来丰富的物质资源,但精神文化发展的不匹配,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现代性的矛盾产生。“新媒介时代,人们生存环境的现代性转型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的强大,更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相契合的精神文化作支撑。”<sup>④</sup>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脉的精髓,对其进行创新性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是对精神文化发展不足的弥补和回应,更是民族自信的一块基石。而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一方面源于文化保存力不强,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因为大众传媒缺席‘传统文化

---

①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0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华社,2017年1月2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③李韵:《〈国家宝藏〉获赞“纪录式综艺”让国宝开口说话》,人民网,2017年12月8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208/c40606-29693242.html>

④周哲:《从现代媒介消费反思人类的现代性生存困境——〈中国诗词大会〉走红背后》,《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3期。

符号的复原与再生产’。”<sup>①</sup>《国家宝藏》作为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正是中央电视台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运用现代化语言,在经历历史沉浮、岁月沧桑的文物上展现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密码,这不仅展现了国家级媒体的文化自信,更是文化担当。在互联网革命浪潮不断席卷、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利用所处的时代优势、发挥传播效应、融合多媒体传播手段,拓展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立足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进行萃取和提炼,紧随时代脉搏,用更易接受的新话语形态完成现代化转化。应“避免简单意义上的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堆砌,拒绝盲目地模仿西方,而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新媒体延展的可能”<sup>②</sup>。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的发展,在大众媒介勇于承担起媒体应有的使命和担当中,获得真正的“新生”。

(责任编辑:高峰)

## “Resurr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Rebir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ons in *National Treasures* for Sprea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ONG Tian-tian, LING Ji-yao

**Abstract:** As an original television program, *National Treasures* takes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ics as its vehicle, uses the excellent television language and appropriate modern expressions to effectively spr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urrent people's demand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s an innovative external form to spread the inner core of national spirit.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National Treasures* uses innovative methods to spr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spectively: serious but lively art forms cre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ritual and showbiz; cross-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in their past and present lives; na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by the people and nation against concrete historical and traditional background. It is hoped that the paper has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gener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the real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ational Treasures*; culture relics;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

①郭讲用:《传播仪式观中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4期。

②曹雪彦:《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